

以经济规律特性认识我国 新时代发展特征

闫 坤 张 鹏

内容提要:如何认识我国新时代发展特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并进行全面科学的把握和学习,是重大理论问题、核心实践要求和全面行动纲领。经济规律是以阶段性特征的哲学思想和构成因素为基础,基于生产组织、产出形态、宏观调控和人民生活等结构要点而形成的在经济运行方面的重要规律。新时代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等三个视角;经济规律强调资源要素、生产方式、配置调控三个层次。本文从三个视角出发,分别提炼了全球化、现代化、初级阶段,新发展理念、供给侧改革、稳中求进,区间意识、底线思维和战略定力等九个方面的新时代特征;从三个层次出发,分别在九个方面中总结并运用经济规律,坚持顶层规划,解决现实问题。以此来落实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指示精神。

关键词:新时代 阶段性特征 经济规律

作者简介:闫 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100732;

张 鹏,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100142。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7)12-0005-14

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26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并“提出新的思路、新的战略、新的举措”,十九大报告则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因此,如何认识我国新时代发展特征,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并进行全面科学的把握和学习,是重大理论问题、核心实践要求和全面行动纲领。新时代强调三个视角: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即从历史阶段、社会阶级和演进规律来看,新时代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历史时期;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视角,即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互动与转化关系出发,新时代表现出怎样的静态特征和动态趋势;三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新时代特征既有应然和必然,也存在着偶然,增强理论自信,保持战略定力,是我们认识必然、借力偶然的重要方法。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对资源要素、生产方式、配置调控三个层次的分析,形成与阶段性特征相呼应的经济规律。

一、以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作为新时代的历史标识

事物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主要矛盾的变动或矛盾主要方面的飞跃性变化。而新时代之所以成为新的历史阶段,最关键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要件就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变化。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表述明确标识了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三个角度突破了“物质文化需要”的含义。第一,物质文化需要仍然是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构成,但重点从“多”“够”转向了“好”“精”,物质文化供给更加强调供给质量和生产效益,并有效对接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第二,美好生活需要的含义更广,除了物质文化之外,人民民主、国家法治、规则公平、社会正义、安全保障、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并成为发展的题中之义;第三,美好生活需要强调人民的主观感受和幸福体验,而不是客观生产和数量分配,是要让人民感受到效用更高、满足更好,而不是数量更多、欲望更强。这样,美好生活需要就成为新时代人民需求的核心构成和重要特征,并作为新时代的发展主题和首要任务。

面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深广内涵,我们必须审视和调整我们的发展模式和生产体系,以供给匹配需求、质量效益统一为基本要求,破除不平衡、不充分的体制机制障碍,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构建和新发展理念的实践。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成为我国创新发展思路,构建新发展模式,形成新发展动力的重要基础,并形成新时代发展的重要特征。

“不平衡”包括经济不平衡、制度不平衡、社会不平衡和理念不平衡等重要领域,并相互影响、彼此牵联、形成整体,解决起来难度大、风险大、影响大,当然,意义和作用也更为巨大。经济不平衡主要包括产业不平衡、区域不平衡和动力不平衡,是“不平衡”的基础;制度不平衡则主要包括准入制度、分配制度、管理制度和产权制度上的不平衡,是“不平衡”的条件;社会不平衡指向了阶层不平衡、收入不平衡、权利不平衡等深层次问题,是“不平衡”的深化;理念不平衡指出了经济与生态、民生与社会、积累与消费、先富与后富之间的不平衡理念关系,是“不平衡”的显化。

而“不充分”则主要包括要素不充分、产业不充分、竞争不充分、模式不充分和形态不充分等,要完善机制,强化治理,形成有序、稳定、活力、创新的良好局面。要素不充分是指新要素的开发、闲置要素的使用和低效要素配置优化上的不足,其改变是走向“充分”的前提;产业不充分是指新产业的培育、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旧动能联动发展上的不足,其改变是走向“充分”的支撑;竞争不充分是指垄断的破除、竞争机制的优化和竞争环境的保障上的不足,其改变是走向“充分”的保障;模式不充分是指新模式的落地程度不够、融合程度不好、对传统经营模式的整合范围和深度不足,其改变是走向“充分”的动力;形态不充分是指技术形态、产品形态和产业形态上的单一和缺失,从而使模块化、分布式、共享经济等新思维、新业态的发展不足,其改变是走向“充分”的效率和延伸。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演进,以新时代为标志的阶段性特征,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并统领各方力量,提升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实现新时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

二、历史视角的新时代特征与经济规律特性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我国正经历着全球化的时代背景,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要求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主题,这些时代性就成为历史视角新时代的发展特征。而与新时代特征相适应的经济规律则表现为要素资源的全球布局,生产方式现代化和经济运行的新常态。

(一)全球化的发展特征与资源要素的全球布局

当今的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全球化浪潮席卷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以改革开放来拥抱整个世界,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和一往无前的决心来引进人类文明的先进思想、体制机制和科学技术,以极富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和共建共享共赢的理念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既是全球化积极的参与者,也是全球化的倡导者和推进者。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并“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

从全球化在当前的发展来看,多极化格局中“极点”互动的特点表现愈发明显,而资源要素也在全球布局中表现出新的特点。20世纪90年代,在“冷战”刚刚结束的世界版图上,美国确定了新的“蝶形”全球战略,该战略以美洲大陆为“体”,以太平洋地区和大西洋地区为“两翼”,形成“一体两翼”的战略架构。在20年来的持续推进下,美国已基本完成了“体”的构建,即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并将战略重心转向推进跨太平洋合作和跨大西洋合作。在美国积极推进“两翼”战略的同时,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也迅速布局并有效展开,目前,已经召开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组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国—中东欧金融公司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组织,重点构筑了6个经济走廊,布局了56个海外经济园区,建设了瓜达尔港、比雷埃夫斯港等重要国际港口,开通了渝新欧、义新欧等10余条中欧新通道,“一带一路”的地缘价值和全球战略地位已初具规模。世界资源贸易中的中国枢纽地位进一步强化,并作为世界重要的资本目的地和避险地而存在;而美国则在制成品贸易中成为“新生力量”,并通过减税和紧缩美元供给成为全球重要的资本流入地。这种新的资源要素布局形成了世界贸易和投资的新态势,“双峰”局面初步形成。中美“极点”互动成为这一时期世界经济格局的新亮点,并通过区域战略和经贸合作形成了“—”型格局(也可表述成“横T型”)。即中美两国形成“极点”互动的G2模式,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为“—”,美国主导的美洲自由贸易区为“|”,世界经济以亚太和泛大西洋地区为主轴,形成了全球化的新格局。

(二)现代化的发展特征和生产方式现代化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新时代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代化既指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又指人民生活的现代化,还强调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我们的事业就是要面向继往开来的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强调生产体系的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强调实体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人民生活的现代化强调收入分配机制的公平公正,强调生活富裕、安定和谐、文化繁荣、法治昌明,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强调国家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法律法规措施系统完整,国家机构体制机制协调有序,国家治理能力的科学性、规范性明显提升。在当前,我国现代化的阶段性特征集中表现在“全面小康社会”和“第五个现代化”建设等两个方面,并与现代化的生产方式相结合,成为统领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两个主线。

针对全面小康社会的时代性,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九大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这些要求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等各个方面。在经济发展上,强调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在提高发展平衡性、包容性、可持续性的基础上,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20年翻一番,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加快提高。按照这一目标,我国在2020年的GDP规模将超过83万亿元,居民人均收入将达到3.5万元以上,城镇化率将达到60%左右,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也应稳定在50%以上。

在社会发展上,强调农村地区的全面发展和扶贫工作的有力开展。即农业现代化取得明显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到2016年末,我国还有4335万农村人口未能解决贫困问题,“十三五”期间,每年将面临超过1100万人口的脱贫压力,而且整体投入更大、难度更大和离散度更大。中央确定将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类扶持贫困家庭,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全面解决贫困问题。

在生态发展上,要求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大力推进“两型”社会建设,提升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发展水平。十九大报告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016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下降5.6%和4%,74个重点城市细颗粒物(PM_{2.5})年均浓度下降9.1%;清洁能源消费比重提高1.7个百分点,煤炭消费比重下降2个百分点。生态发展取得了重大突破,并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实现了有效协同,成为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阶段性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突出表现为国家治理手段和理念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从财政治理的角度来看,“三大改革”齐头并进,并在机制和制度的建设上取得了新的成绩。预算管理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了预算公开、部门预算编制、政府资产负债表、财政专户管理、政府购买服务等多项内容,并着力向资金统筹使用、中级财政预算和国库集中收付等问题进行突破;税制改革则在税制框架上取得重大突破,根据2017年上半年的情况,在不扣除出口退税的条件下,直接税占比达到43.5%,而间接税占比则为59.2%,税制结构优化取得了初步成果;而营改增、资源税改革基本完成,消费税、个人所得税、环境保护税和房地产税的改革都进入关键阶段,结构性减税也随着税制改革而推进到新的阶段;政府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对政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进行了有效的明确,并对非直接的财政事权进行方向性的规范。而在金融治理层面,数量型货币政策体系已经基本构建完成,外汇占款、抵押再贷款、公开市场操作、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等手段操作得当,机制性明显增强;价格型货币政策随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的推进,目前已经形成了初步的价格形成机制和传导机制,但对于形成良好的比价体系、估值体系和溢价体系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足,需要在治理体系中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金融市场保持平稳发展,到2016年年末,我国银行业的存贷款规模分别达到了156万亿元和112万亿元,证券业总资产为5.79万亿元,净资产为1.64万亿元,净资本为1.47万亿元,保险业共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3.10万亿元,同比增长27.50%。

(三) 初级阶段的发展特征与经济新常态

我国最大的实际就是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要牢

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十九大报告强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当前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经济新常态”和“建设伟大工程”。要努力形成经济新常态的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演进路径,确立经济新常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大逻辑”的定位,要毫不动摇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

1. 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特征

严格地说,我国正处于从旧常态向新常态过渡的进程之中。经济新常态的各个趋势特征正在形成并不断强化,经济转型的速度正在不断提升,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为基础的新动力正在不断积累,消费、投资、进出口和市场机制的新格局正在不断形成。

2017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保持在6.9%,总体处于中高速增长的良好区间,增加值总量新增规模接近2.5万亿元,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支撑。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业主导经济增长的特征更加明显,服务业占经济的比重达到了54.1%,高于第二产业14个百分点。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上半年同比分别增长13.1%和11.5%,增速分别高于规模以上工业6.2和4.6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分别达到12.2%和32.2%。在需求方面,居民消费加快转型升级,服务消费和耐用消费品占比提升,高技术产业投资快速增长,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正在调整优化。

与经济转型相适应,经济增长质量也在不断地提高。企业效益明显改善,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了22%,增速高于2016年同期1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利润率达到6.11%,同比提高0.42个百分点。居民收入增速继续快于经济增长。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3%,高于2016年同期0.8个百分点,比同期的经济增速高出了0.4个百分点。

在经济增长的动力基础上,根据初步的投入产出表的测算,2016年我国的全年全员劳动生产率为94825元/人,比上年提高6.4%。而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为15500亿元,比2015年增长9.4%,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08%,其中基础研究经费798亿元,累计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488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131个,国家工程实验室194个,国家企业技术中心1276家。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成为中国经济新的重要支撑。

2. 新的伟大工程

新的伟大工程是从党的十七大以来,以党的建设为基础,根据时代的特征和党的使命而做出的重大方针决策。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新的伟大工程是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重大思想的极大丰富和完善。十九大报告指出,“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党的建设就要推进到什么阶段,这是我们党栉风沐雨95年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历史昭示,也是迈向复兴征途的现实启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展现了我们党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时代担当,也彰显了我们党强劲的生机活力与深邃的历史使命感。只有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集中整饬党风,严厉惩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才能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内政治生活展现新气象,赢得了党心民心,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重要保证,新的伟大工程的建设也由此而推进到新的高度、新的水平。

三、辩证视角的阶段性特征与经济规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当前经济社会运行阶段性特征的基本方法和理论源泉。与历史视角的阶段性特征和经济规律的适应性特点不同,辩证唯物主义的三大基本规律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相结合,形成了新时代发展特征与经济规律的融合表征。具体有如下三个方面。

(一)新发展理念与对立统一规律相结合的阶段性特征

对立统一规律也即矛盾规律是新发展理念作为阶段性特征的重要基础。经过改革开放近 40 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变化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此为基础和方向,需要转变我们的发展方式,践行新的发展理念,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具体有:

1. 以创新发展作为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我们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本文根据科技部在 2017 年 8 月公布的“科技研发和创新报告”,对创新发展的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2015 年,全国开展研发(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 7.4 万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19.2%。拥有研发机构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共 5.3 万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 13.8%;企业有 R&D 人员 364.6 万人,R&D 人员全时当量为 263.8 万人年;企业的 R&D 经费支出达到 10013.9 亿元,比 2014 年增长 8.2%;企业 R&D 经费投入强度为 0.90%。有 20 个行业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超过了 100 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申请发明专利 24.6 万件,发明专利拥有量为 57.4 万件。

2015 年,我国技术市场交易额稳步增长,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提质增效、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全年共签订各类技术合同 30.7 万项,成交金额 9835.79 亿元。合同成交金额占全国 GDP 的比重继续增加,达到 1.45%,平均每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320.25 万元。

2015 年,中国创业投资各类机构数已达 1775 家,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增速达到 14.4%。全国创业投资管理资本总量达到 6653.3 亿元,占 GDP 总量的 0.96%。全年披露新募基金 197 家,较 2014 年增长 16.6%。全国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累计投资项目数达到 17376 项,其中投资高新技术企业项目数 8047 项,占 46.3%。江苏、浙江、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一直是创业投资机构最为集聚的地区,这些地区的风险投资机构数量达到 1130 家,占全国总量的 63.7%。

当前,我们一方面要强化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

技术创新,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另一方面要构建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破除束缚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优化创新政策供给,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倡导创新文化,形成创新活力竞相迸发、创新成果高效转化、创新价值充分体现的体制机制。

2. 以协调发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基础支撑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增强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整体性。

在城乡协调发展上,要着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发展,提升县域经济支撑辐射能力,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间均衡配置,拓展农村广阔发展空间,形成城乡共同发展新格局。尤其要注重培育发展充满活力、特色化、专业化的县域经济,提升承接城市功能转移和辐射带动乡村发展能力。

从支撑数据来看,表现为城乡差距持续缩小。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616元,比2012年增长39.3%,实际增长28.6%,年均实际增长6.5%。2016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363元,比2012年增长47.4%,实际增长36.3%,年均实际增长8.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1.5个百分点。2016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为2.72(农村居民收入=1),比2012年下降0.16。图1展示了2012年以来的城乡收入变化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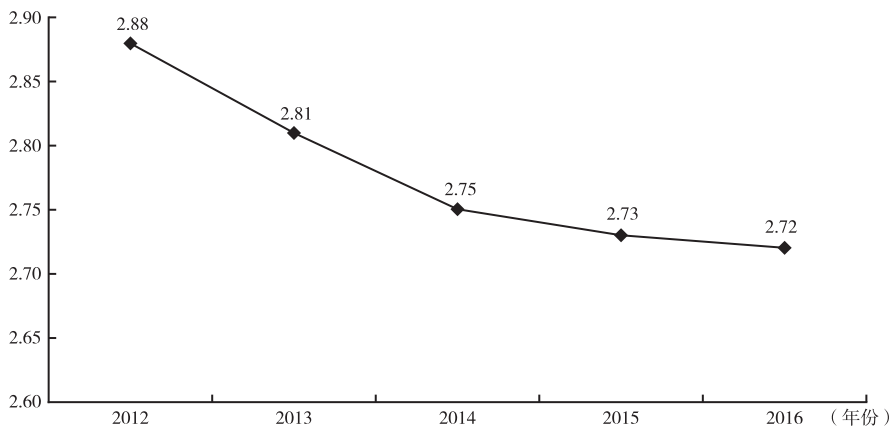


图1 2012年以来的城乡收入倍数差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在做好区域协调发展上,要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指标是地区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程度越来越好。2012年以来,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为10.3%,比中部地区高0.4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高0.9个百分点,比东北地区高1.8个百分点。2016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

之比为 1.67(西部地区居民收入=1,下同),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 1.09,东北地区与西部地区居民人均收入之比为 1.21。东部与西部、中部与西部、东北地区与西部收入相对差距分别比 2012 年缩小 0.06、0.02、0.08。而在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财力上,西部地区的人均财力为系数 1,东部地区则为 1.03,中部地区为 0.79,东北地区为 0.92,表现出比收入差距更加平衡、收敛的格局。

在做好“四化”同步、产业协同上,要大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支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要深入实施《中国制造 2025》,以提高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基础能力为重点,推进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促进制造业朝高端、智能、绿色、服务方向发展,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要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要牢牢把握信息技术变革趋势,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推动信息经济发展壮大。

3. 以绿色发展作为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要求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新贡献。

2012 年以来,全国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着力改善生态环境,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构建生态安全屏障,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控制,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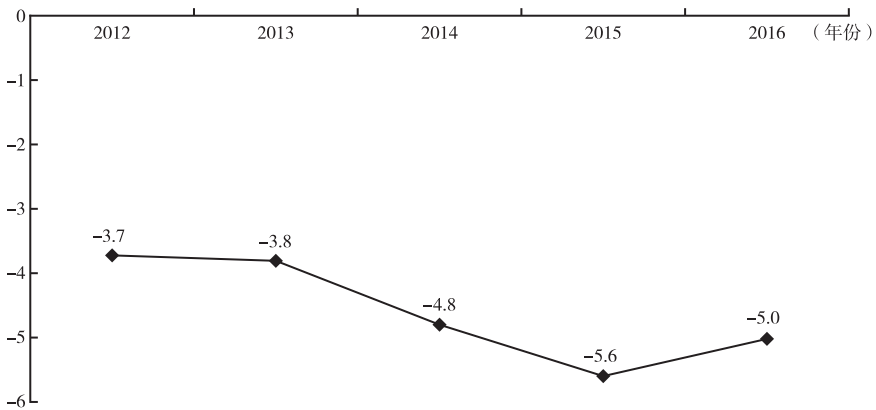


图 2 2012 年以来单位 GDP 的能耗降低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节能减排成效显著。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整体提升,单位 GDP 能源资源消耗明显下降(见图 2)。2016 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用水量分别比 2012 年下降 17.9% 和 25.4%。主要污染物减排效果显著。2015 年,全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比 2012 年下降 8.3%,氨氮排放量下降 9.3%,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 12.2%,氮氧化物排放量下降 20.8%。

环境质量稳步改善。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城市空气状况趋于好转。2016年,在监测的338个城市中,城市空气质量达标的城市占24.9%,比2015年提高3.3个百分点;细颗粒物(PM_{2.5})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年平均浓度52微克/立方米,比2015年下降8.8%。海洋环境改善。在近岸海域海水水质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占73.4%,比2012年提高4个百分点;四类、劣四类海水占16.3%,比2012年下降7.6个百分点。

4. 以开放发展作为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手段

十九大报告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内外需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我们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投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开创对外开放新局面,并着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根据十九大的战略部署,我国将着力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实施优进优出战略,推动外贸向优质优价、优进优出转变,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实行高水平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贸易,提升服务贸易占对外贸易比重。巩固提升传统出口优势,促进加工贸易创新发展。优化对外贸易布局,推动出口市场多元化,提高新兴市场比重,巩固传统市场份额。鼓励发展新型贸易方式。发展出口信用保险。积极扩大进口,优化进口结构,更多进口先进技术装备和优质消费品。积极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强化贸易摩擦预警,化解贸易摩擦和争端。

2016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24.3万亿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保持在11%以上。货物贸易方式不断优化,一般贸易进出口占比由2012年的52.0%上升到2016年的55.1%。服务进出口快速发展。2016年,服务进出口总额6575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36.7%,年均增长8.1%,稳居世界第二位。高附加值领域服务出口增长势头强劲,2016年维护和维修服务、信息服务出口均实现40%以上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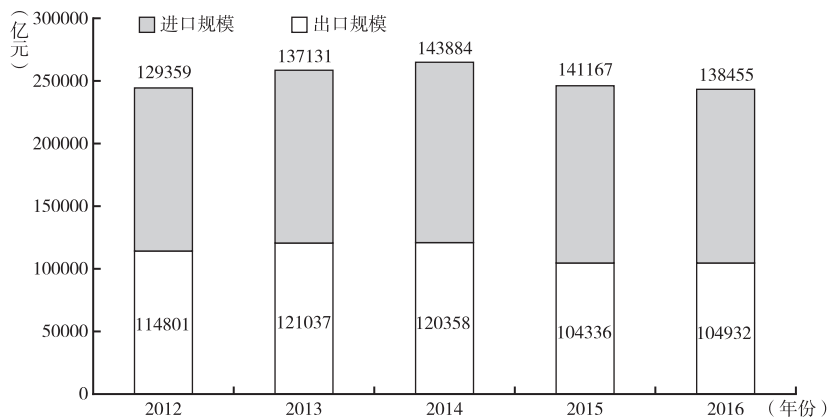


图3 2012年以来的进出口规模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数据库。

第二,提升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水平。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并“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积极有效引进境外资金和先进技术,提升利用外资综合质量。放开育幼、建筑设计、会计审计等服务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扩大银行、保险、证券、养老等市场准入。鼓励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和中西部及东北地区,支持设立研发中心。“凡是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国外融资。支持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物流链。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及合作园区,积极搭建对外投资金融和信息服务平台。

近年来,我国双向投资达到新水平,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双向投资基本平衡。2013—2016年,我国累计实际使用外资4894亿美元,年均增长3.1%;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为4915亿美元,年均增长21.6%。吸收外资的质量提高。2016年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5716亿元,比2015年增长8.3%,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增长86.1%。

第三,健全“一带一路”合作机制。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围绕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健全“一带一路”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推动与沿线国家发展规划、技术标准体系对接,推进沿线国家间的运输便利化安排,开展沿线大通关合作。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项目为基础、各类基金引导、企业和机构参与的多元化融资模式。加强同国际组织和金融组织机构合作,积极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发挥丝路基金作用,吸引国际资金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

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为6.3万亿元,占我国贸易总额比重达25.7%。截至2016年末,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立初具规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56个,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

5. 以共享发展作为增强发展动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抓手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始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全面小康是全国人民的小康,要全力实施脱贫攻坚工作,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贯彻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创新扶贫工作机制和模式,采取超常规措施,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近年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深入实施,扶贫工作机制和模式不断创新,金融扶贫、产业扶贫、易地扶贫、教育扶贫等成效明显,脱贫攻坚战取得新胜利。按照每人每年2300元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2016年农村贫困人口为4335万人,比2012年减少5564万人,平均每年减贫近1400万人;贫困发生率下降到4.5%,比2012年下降5.7个百分点。

共享发展强调要改革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并稳步提高社会保障统筹层次和水平,尽快实现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2016年末,参加基本养老、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人数分别比2012年末增加9981万人、20751万人、2864万人、2879万人和3022万人。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自2005年开始连续12年上

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整合取得实质性进展,2015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下降到29.3%,基本医保总体实现全覆盖。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否定之否定规律结合的阶段性特征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指对发展模式、组织方式和产品形态的“扬弃”,即通过“否定”形成“去芜存菁”,通过“再否定”形成“青出于蓝”,从而把表面上的循环往复转变成“波浪式”前进和“螺旋式”上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形成了较为完备和较具竞争力、影响力的国民经济体系,通过创新投融资方式和支持企业滚动发展实现了产能的极大扩张;通过引进外资和扶持龙头企业的方式,形成了“中心—外围”结构的产业生态;通过延长产业链、细化分工形成了标准化的生产组织方式;通过产业集聚和专业园区实现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完美融合。以“标准化产品+价格竞争+同质市场覆盖”的模式,中国制造横扫全球,并一举解决了国内供给短缺的问题,对传统的分散型、小型和非标准型生产的“否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随着“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渐成主流”,“模仿型和排浪式的阶段基本结构”等趋势的形成,标准化生产体系匹配个性化消费需求的难度越来越大,我们必须对现有的生产体系进行调整和完善,以使其能够匹配最终需求,“再否定”的阶段性表现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增加有效供给,减少无效供给,即强调供给必须匹配需求(有效供给),而且着力点并非单一厂商,而是整个供给体系,即通过供给体系的改革实现高效率、低成本、高质量的差异化产品生产,实现对个性化、多样化需求的匹配。具体到理念和手段上,“制造+再制造”“增材制造”“柔性生产”“虚拟现实”“工业机器人”“区块链协同”等就成为新的时代名词;而表现在企业的组织模式上,小型化、专业化和智能化成为新的趋势和方向。“再否定”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质,也成为中国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内生动力。

坚持“三去一降一补”,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发挥核心力量和提供良好环境。在以往“三去一降一补”的改革策略和布局体系之中,很少提及“三去一降一补”彼此之间的逻辑关系,而是将其作为独立同分布的政策向量,予以分别施行。而从体系结构出发,应在阶段性上体现并着力解决这一问题。具体有以下方面。

第一,“去产能”总体处于优化行动和率先收获的领域。因为供给侧改革强调生产模式和企业组织的变革,必然导致部分生产设备过剩,部分产能闲置。抓住有效时机进行产能处置,一方面可以有效盘活生产性固定资产的价值,使转型企业面临的压力有所降低;另一方面可以使资源与要素从原有的经济结构和生产体系中释放出来,从而配置到效益更好、效果更加突出的领域中去。因此,“去产能”的主要职能是优化经济资源和要素的配置水平与市场环境。

第二,“去库存”总体处于与“去产能”相衔接的位置。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对生产性库存要进行合理而有序的去化,以降低企业的存货风险和库存成本,并且可以推动企业主动采用新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也即去库存的第一层含义是为了增强企业转型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对资产性库存要进行合理的利用和去化,房地产的库存高企、价格高企、泡沫累积的程度较高,通过对资产性库存的合理利用,既支持实体经济企业的发展,又有效地降低宏观经济风险和资产市场风险,降低风险成为去库存的另一层含义。

第三,“降成本”总体上处于第三个推进层次。在释放闲置资源和要素,有效控制风险并增强转型的主动性的条件下,要通过“降成本”做好三件事:一是稳,稳住现行经济主体的经营状况和生产安排,获得一个相对良好的改革环境;二是转,通过具有结构导向性安排的降成本措施,支持并引导企业的转型,低成本的环境和高收益的引导,往往很快可以形成市场的正向协同;三是增,通

过降成本来增加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收益水平,并形成趋势性和递增性的预期,这样有助于资本和资源向供给侧改革的关键环节进行集中,从而自动破除转型和发展“瓶颈”。

第四,“去杠杆”将资产价格回归到收益率定价的轨道中来。“去杠杆”的直接含义是防范现金流和资产价格风险,而出现风险的原因是资产价格与资产收益之间的比率失衡,从而导致资产收益低于形成资产所须偿还的债务成本,一旦现金流断裂,就将启动资产处置程序,较高的资产价格风险就势爆发。因此“去杠杆”的本质要求是将资产价格回归到与收益率相匹配和平衡的水平上去,收益率高,资产价格高,融资能力强,资源和要素集聚水平高,而不是依靠资产溢价来螺旋上升的资产泡沫。

第五,“补短板”是对供给侧改革的新环境破除“瓶颈”,优化环境,保障产权,培养动能。我国当前存在的短板既有资源、要素、资本等配置失衡的硬短板,也有制度、机制、措施和产权等设计落后或是保障不足的软短板。在供给侧改革取得初步成果后,通过“补短板”迅速推动供给侧改革的新模式、新业态、新技术发展壮大,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能。也即“补短板”不是补当前的短板,而是补转型的短板,以及转型之后新发展环境的短板。目前,应着力于基础性和共性短板的推进与完善。

2017年上半年“三去一降一补”取得了重要的突破:第一,过剩产能有序化解,上半年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6.4%,比2016年同期提高3.4个百分点;第二,房地产去库存效果继续显现,6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9.6%,降幅比3月末扩大3.2个百分点;第三,企业杠杆率下降,6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5.9%,同比下降0.8个百分点;第四,企业成本继续降低,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69元,同比减少0.02元;第五,短板领域得到加强,上半年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教育投资同比分别增长46.0%、17.5%、14.7%和17.8%,均明显快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

(三)稳中求进与质量互变规律相结合的阶段性特征

质量互变规律强调量变的重要性和面对质变的信心、决心和能力,稳中求进就是质量互变规律在当前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稳”强调量变的环境,即通过系统性、渐进性、小幅度的量变实现对发展瓶颈和机制制约的突破,进而为局部质变的“进”创造良好的条件和重要的突破口,从而量变带动局部质变,局部质变为系统性、全局性变革创造和准备条件。

2013年以来,我国一直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量变在不断地积累,局部质变也在有序地发生,至2016年年末,主要领域的“四梁八柱”性改革基本出台。仅以经济体制改革而论,财税体制改革在“总体方案”的指导下,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营改增”“预算公开”“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改革都在一步一步推进的基础上取得了全面或局部的质变效果;金融体制改革针对多层次资本市场、现代保险业、政策性银行和普惠金融等都做出了重大改革部署,而量变性的改革也在稳步推进之中,如商业银行的辅业开始逐步从主业中启动分离安排,信用卡、理财、个人银行、直销银行、小微企业信贷和专业投资机构开始单独持牌并成为独立金融子公司;国有企业改革的“1+N”框架基本建立,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在结合我国国有企业基本特性并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基础上,完成了“1”的构建,随后出台了《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办法》《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改革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N”的文件,国有企业改革框架在稳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完善和优化;而在垄断行业改革上,在不少人民群众还在报怨垄断企业的各种“恶行”的时候,随着2017年5月21日国务院油气改革指导意见的颁布,我国能源、交通、通信、金融和军工等领域的垄断行业改革方案已基本完成,改革的重心转入推进落实阶段。量变带来的局部质变在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中随处可见,坚持稳中求进的时代特征,将改革进行到底。

四、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区间意识、底线思维和战略定力是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认识论是关于人类的认识来源、认识能力、认识形式、认识过程和认识真理性问题的科学认识理论。它首先是可知论,即从“必然”的角度出发,人们不仅能够认识物质世界的现象,而且可以透过现象认识其本质;它其次是反映论,即将人的经验和意识与分析 and 归纳相结合,从而在“偶然”的基础上产生正确的预期和判断;最后它还是实践论,即从“应然”的角度产生理论总结,并将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认识的目的和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一)区间意识是认识论中“应然”原则的阶段性特征

具体是指对经济运行设定合理(意)区间,当经济在区间内运行时,无论增速高一点,还是增速低一点,都属于正常的现象。这一方面使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加协调、规范,另一方面也给改革以必要的空间和时间。

2012年以来,我国宏观调控转向区间调控,即只要经济在合理的区间内运行,就不安排“强刺激”政策,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并以“点调控”和“微刺激”来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2015年则在区间调控的基础上,基于对政策效果的认识和判断,实施了定向调控和相机调控,使政策与经济的匹配程度更好、政策效率更高,并成功完成了2016年经济“探底”、2017年经济“企稳”的目标。

(二)底线思维是认识论中“必然”原则的阶段性特征

这一判断也即经济效率的提高、社会文明的发展都将导致一定程度的生产要素和组织因子的活跃,从而加大不确定性。我们坚持底线思维,在没有达到底线(已知的“必然”)之前,通过提升监管水平和处置能力应对风险的变动,而一旦达到了底线,则以控制风险作为第一要务,予以系统、规范和有效的处置。

底线思维最主要的表现就是201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其中规定,在风险达到IV级之前,地方政府应有序安排本地的财政支出和投资事项,确保政府运转和公务员工资,并协调推进地方经济发展、社会保障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跨区域公共事务管理等项工作。而在风险达到IV级之后,在恢复正常偿债能力前,除国务院确定的重点项目外,原则上不得新上政府投资项目。在建政府投资项目能够缓建的,可以暂停建设,腾出资金依法用于偿债,此外,市县债务管理领导小组或债务应急领导小组认为确有必要时,可以启动财政重整计划。而当风险达到I级的标准后,除缓建项目、出售资产、压缩经费和降低福利之外,还将由省级政府暂停相关涉事市县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资格,并启动债务风险责任追究机制。相关风险底线以风险应对为第一要务,部分管制性措施在约束风险进一步扩张的同时,也将减少风险的处置和缓冲空间,但从底线思维的角度出发,这种牺牲是值得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阻止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滥用信用,确保我国财政体系的平稳、可持续发展。

(三)战略定力是认识论中“偶然”原则的阶段性特征

“偶然”不代表趋势,但又反映变化。因此,面对“偶然”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改革的方向,坚持发展的目标,但又不忽视可能存在环境变化。比如当前,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刺激,速度也跌不到哪里去。因此,对一些经济指标回升,不要喜形于色;对一些经济指标下行,也别惊慌失措。保持战略定力就一定可以迎来中国经济的新局面。

以2017年8月份经济数据为例,该数据的公布引发了市场的一片哗然,许多重要的运行指标在数据上表现出了明显的下滑。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降至10.1%,比1~7月份的均值

下滑了 0.3 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至 7.8%,较 1~7 月份下降了 0.5 个百分点;而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同比实际增长为 6%,较 7 月份回落了 0.4 个百分点。但实际上,社会消费品的结构正处于改善之中,汽车、通信器材等耐用消费品的增速均明显超过年度均值,不断优化的国债收益率曲线也在为市场的消费融资提供强大的支撑;而在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中,汽车、造船、铁路、电气机械等装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均保持在 8%左右的良好状态,计算机、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高达 25.4%;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出中,机电类、装备制造类的增加值增速均远远超过 6%的平均增速,主要产品的产量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均保持稳定增长或增速加快的情况。这些隐藏在表面数据背后的变化实际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趋势性变化,随着积极因素的不断积累,我国经济的基础条件、要素构成、动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都将成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

参考文献: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新华社,2017 年 10 月 18 日。
2. 《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3. 习近平在 7 月 26 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新华社,2017 年 7 月 27 日。
4.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社,2013 年 11 月 18 日。
5.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新华社,2015 年 10 月 29 日。
6. 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新华社,2016 年 3 月 17 日。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Our Country's New Era with Economic Regularity

YAN Kun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ASS, 100732)

ZHANG Peng (Chinese Academy of Fiscal Sciences, 100142)

Abstract: How to understand the New Era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development, and a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grasp and learning, is a major theoretical issue, core practice requirement, and comprehensive action program. The economic law is based on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and constituent factors of the phased features, and the important laws of economic operation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points such as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output form, macrocontrol and people's life. New Era emphasi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epistemology and other three perspectives; economic law emphasizes the resource elements, production methods, configuration control three levels. In this paper, three aspects of globalization, modernization, primary stag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supply side reform, steady progress, interval consciousness, bottom line thinking and strategic strength are extract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Three levels, respectively, in nine aspects of the summary and use of economic laws, adhere to the top plan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These will implement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s a new historical orientation for China's development, which was pointed out in the report of the Nineteen major reports, and implement the spirit of the instructions "firm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tage characteristics" that was propos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Keywords: New Era, Phased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Law

JEL: O10, N01

责任编辑:汀 兰